

ZHONGGUO XIANDAI

中国现代

文学思潮史

魏金枝 浙江大学出版社

WENXUE SICHAO SHI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

**魏绍馨**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850×1108 1/32 印张13.75 插页1 字数344.9千 印数1-3,000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

ISBN 7—388—00142—3

I·007 定价：5.00元

# 目 录

## 第 一 编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思想启蒙与文学革新运动

### 第一章 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的思想启蒙运动

- 第一节 西方新思想的输入……………( 1 )
- 第二节 传统旧文化的批判……………( 8 )
- 第三节 中西思想启蒙运动之比较……………( 13 )

### 第二章 “文界革命”与“诗界革命”

- 第一节 清末文坛与文学革新运动……………( 18 )
- 第二节 “文界革命”说……………( 23 )
- 第三节 “诗界革命”论……………( 27 )

### 第三章 “小说界革命”的理论与实践

- 第一节 小说社会价值的新认识……………( 33 )
- 第二节 为“新民”、“新中国”而“新小说”……………( 38 )
- 第三节 中国小说史的初步研究……………( 44 )
- 第四节 中国小说美学的再探讨……………( 49 )

### 第四章 王国维的文学思想

- 第一节 关于王国维及其历史评价……………( 54 )
- 第二节 超功利主义的文艺观……………( 57 )
- 第三节 对于文学艺术特征的探求……………( 62 )
- 第四节 “境界”与“意境”说……………( 66 )

## 第二编

### 文学革命与五四文学的主潮

#### 第五章 五四文化革命与新思想的传播

- 第一节 从思想启蒙到文化革命……………( 71 )
- 第二节 对封建旧文化的全面挑战……………( 76 )
- 第三节 民主、科学与社会主义新思想的传播……………( 81 )

#### 第六章 五四文学革命与新文学的诞生

- 第一节 新文学整体观念的确立……………( 89 )
- 第二节 白话应是“中国文学之正宗”……………( 92 )
- 第三节 “人的文学”与“平民的文学”……………( 99 )
- 第四节 以外国文学为师……………( 105 )

#### 第七章 创造社及其浪漫主义

- 第一节 “异军突起”的创造社……………( 111 )
- 第二节 从古今中外的浪漫主义思想与文艺中吸取营养……………( 117 )
- 第三节 强调文学创作中的“自我表现”……………( 122 )
- 第四节 重视文学艺术的美学特征……………( 129 )

#### 第八章 文学研究会及其现实主义

- 第一节 在斗争中形成和壮大的文学研究会……………( 136 )
- 第二节 对人生的执着与探求……………( 142 )
- 第三节 “为人生”的文学观……………( 146 )
- 第四节 “写实主义”的艺术方法论……………( 153 )

## 第三编

###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 第九章 革命文学运动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传播

|                     |                                   |         |
|---------------------|-----------------------------------|---------|
| 第一节                 | 早期革命文学的理论与创作·····                 | ( 160 ) |
| 第二节                 | “左联”成立前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br>动的理论与实践····· | ( 166 ) |
| 第三节                 |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传播·····                 | ( 172 ) |
| 第四节                 | 左倾文艺思潮的产生与批判·····                 | ( 179 ) |
| <b>第十章 鲁迅的文学思想</b>  |                                   |         |
| 第一节                 | 在中西文化撞击中的哲学选择·····                | ( 185 ) |
| 第二节                 | 从“为人生”到“为工农大众”·····               | ( 191 ) |
| 第三节                 | 以“立人”为目的的文学意识·····                | ( 195 ) |
| 第四节                 | 开放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论·····                 | ( 202 ) |
| <b>第十一章 茅盾的文学思想</b> |                                   |         |
| 第一节                 | 从“为人生”到走上为无产阶级的革<br>命文学道路·····    | ( 208 ) |
| 第二节                 | 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论·····                   | ( 213 ) |
| 第三节                 | 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批评·····                  | ( 221 ) |
| 第四节                 | 雄伟、丰厚、健壮的审美理想·····                | ( 225 ) |
| <b>第十二章 瞿秋白与冯雪峰</b> |                                   |         |
| 第一节                 | 向俄苏文学学习·····                      | ( 230 ) |
| 第二节                 | 为新文学的大众化而呼唤·····                  | ( 237 ) |
| 第三节                 | “为着普洛现实主义而斗争”·····                | ( 242 ) |
| 第四节                 | 鲁迅文学道路的肯定·····                    | ( 248 ) |

#### 第 四 编

二十至三十年代文学思潮的开放性发展

|                        |                     |         |
|------------------------|---------------------|---------|
| <b>第十三章 新月派及其新古典主义</b> |                     |         |
| 第一节                    | 胡适及其“整理国故”论·····    | ( 254 ) |
| 第二节                    | 新月社的形成及其新格律诗运动····· | ( 260 ) |
| 第三节                    | 后期新月派与梁实秋的人性论·····  | ( 267 ) |

|      |                        |         |
|------|------------------------|---------|
| 第十四章 | 从语丝派到论语派的个性表现主义        |         |
| 第一节  | 从《语丝》到《论语》             | ( 274 ) |
| 第二节  | 周作人的“个性的文学”            | ( 279 ) |
| 第三节  | 林语堂的“性灵”说              | ( 285 ) |
| 第十五章 | 从象征派到现代派的现代主义          |         |
| 第一节  | 象征主义与“新浪漫主义”在五四以后的广泛影响 | ( 292 ) |
| 第二节  | 初期象征派诗人及其诗论            | ( 296 ) |
| 第三节  | “现代派”的出现及其文学思想         | ( 301 ) |
| 第十六章 | 巴金和老舍                  |         |
| 第一节  | 独特的文学道路                | ( 310 ) |
| 第二节  | 巴金的文学追求——“以人类之悲为悲”     | ( 318 ) |
| 第三节  | 老舍的审美选择——“情与理合”的幽默艺术   | ( 325 ) |

## 第五编

|      |                             |         |
|------|-----------------------------|---------|
|      | 三十至四十年代文学思潮的一元化趋向           |         |
| 第十七章 |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文学运动中的民族主义思潮        |         |
| 第一节  | “民族主义文学”——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 ( 332 ) |
| 第二节  | 为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而呐喊                | ( 338 ) |
| 第三节  | 从“大众化”到“民族形式”的探求            | ( 343 ) |
| 第四节  | “民族主义文学”的再批判与五四文学传统的再认识     | ( 348 ) |
| 第十八章 | 胡风的文学思想和“七月”文学流派            |         |
| 第一节  | 胡风文学思想的形成                   | ( 354 ) |
| 第二节  | 人本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论                | ( 361 ) |

|      |                                     |         |
|------|-------------------------------------|---------|
| 第三节  | 胡风与“七月”文学流派·····                    | ( 371 ) |
| 第四节  | 关于“胡风文艺思想批判”·····                   | ( 377 ) |
| 第十九章 | 京派文学及其创作理论                          |         |
| 第一节  | 京派文学的形成与发展·····                     | ( 384 ) |
| 第二节  | 沈从文的“生命重造”说·····                    | ( 388 ) |
| 第三节  | 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                    | ( 396 ) |
| 第四节  | 关于“自由主义文艺”的批判·····                  | ( 403 ) |
| 第二十章 | 延安文艺整风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                   |         |
| 第一节  | 整风前的延安文艺思潮·····                     | ( 407 ) |
| 第二节  |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br>——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 | ( 412 ) |
| 第三节  | 文学创作的群众化·····                       | ( 420 ) |
| 第四节  | 文学批评的政治化·····                       | ( 425 ) |

# 第一编

##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 思想启蒙与文学革新运动

### 第一章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 初的思想启蒙运动

#### 第一节 西方新思想的输入

早在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欧洲各国就先后出现了声势浩大的文艺复兴与思想启蒙运动，为西方的近现代文学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在此同时，中国也曾经产生了以李卓吾、汤显祖、袁中郎为代表人物的思想与文学解放运动，以及以《儒林外史》、《红楼梦》为代表的优秀文学创作。只是由于中国的封建社会及其文化思想具有特别悠久的历史与雄厚的势力，而使这个思想与文学解放运动未能取得更显著的成果，更未促成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产生。

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步步深入的侵略，一方面置中国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逐步丧失掉自己的主权；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激起了新的思想启蒙与文学革新运动。特别是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和次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更加坚定了许多爱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变法革新的决心。戊戌变法虽然被封建顽固派镇压下去了，可是空前的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思想启蒙与文学革新运动，却如冲破闸门的洪水奔腾向前，势不可挡。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思想启蒙与文学革新运动（后者是前者的一部分），是从介绍和传播西方民主主义新思想新文化开始的。铁的事实和血的教训告诉人们：地大物博的旧中国已远远落后于世界形势的发展，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面向世界，急起直追，真心诚意地向先进国家学习。所以，“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象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维新派诗人黄遵宪，早在1877年就出任驻日使馆文化参赞，1882年又改任驻美旧金山总领事，1885年回国，对于日本向西方学习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有许多了解。他在回国后所著的《日本杂事诗》与《日本国志》中，极力向国内读者介绍他在日本所看到的“泰西之学”以及日本人学习西学实行“明治维新”的实况。当时的黄遵宪，对于“西学”及日本“明治维新”的理解还是肤浅的，有些甚至是错误的，但其上述著作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眼界的开阔与思想的解放，的确产生了重大作用，因而引起了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高度重视。他们当时正在潜心阅读“西书”，研究如何在中国实行维新变法。不久，以介绍“西学”、宣传维新变法为主要内容的《时务报》、《强学报》、《国闻报》、《中外纪闻》（初名《万国公

报》)、《知新报》等,先后创刊。在介绍“西学之书”,传播西方新的文化思想方面,严复是贡献最大的一位先进知识分子。他于1876年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1879年回国,不仅对西方文化思想有深入研究,而且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与救亡图存的雄心大志。但是回国后英雄无用武之地,清政府只委以船政学堂及水师学堂的教习。甲午战争惨败与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严复以悲愤交加的心情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了震动中外的政论文章《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抉论》等,同时就开始了有计划地翻译与介绍西方的学术名著。从1898年到1909年这短短的十年间,他先后翻译与出版的“西书”有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密亚丹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与《名学》,斯宾塞的《群学肆言》,甄克思的《社会通论》和孟德斯鸠的《法意》等。正如李泽厚所指出的,通过这些译述,严复带给人们的不只是某些资产阶级的理论学说而已,更重要的是,“他结合这些介绍、翻译,创造性地给予了当时的中国人以一种新鲜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从思想根基上突破了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作为一位杰出的宣传鼓动家的梁启超,他在介绍西学与整个思想启蒙运动中的贡献,是决不容忽视的。早在戊戌变法之前,他就在自己主编的《时务报》上发表过《西学书目》与《变法通议》,主张学习西方实行改革。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亡命日本,进一步认识到“欲新吾国,当先新吾民”,“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于是他便以全力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从事于介绍和宣传西方各种新学说、新思想的活动。仅在1902年,他就发表有《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乐利主义者泰斗边沁之学说》、《论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同时他还在

《新民说》、《新民议》、《少年中国说》等文中，以平易流畅、生动活泼而又热情洋溢的语言，向国人介绍了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的思想，奋斗不息的进取精神，因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他后来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自己当时“将世界学说为无限制的尽量输入”，实“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郭沫若则称他为“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人”，当时的青少年“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少年时代》）。谭嗣同是戊戌政变中被以西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杀害的六君子之一。1893年他在上海与英人付兰雅相识，并在付的影响下购买了许多西学书报进行研读。甲午战争之后，谭嗣同决心摒弃一切旧学问，“专精致思”地研究与宣传“西学”，走维新变法的道路。充满革命精神的《仁学》，就是他在戊戌变法前夕完成的启蒙主义代表作。谭嗣同虽然被杀了，但他的著作却由梁启超于1899年带往东京出版，曾经在当时的青年中、特别是在革命派的青年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政治立场上看，上述几人都属于资产阶级改良派，但是他们的那些论述却远远超出了改良派的政治主张，可以说是以崭新的思想启发与教育了二十世纪初期的一代青年，包括后来成为杰出文学家的鲁迅、郭沫若等人。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思想启蒙运动中，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都对中西文化思想进行过初步地比较与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致力于西方民主与科学的介绍与宣传。严复在其《论世变之亟》中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其为学者，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他认为这是西方所以先进而强大、中国所以落后而衰弱的重要原因。当时的洋务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反对引进西方的文化思想，

严复则提出“体”与“用”分不开，西方国家的民主是与自由紧密相联的。他们“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一洲之中，散为七八，争驰并进，以相磨砢，始于相忌，终于相成，各殚知虑，此既日异，彼亦月新”（《原强》）。西方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他们相信“人权天赋”：“惟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所以人人都有自由，“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各种法律与刑禁都是为了保护这种自由与民主的权利（《论世变之亟》）。在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国，一切都是皇帝及其家族的私产，但在西方就不同，“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通国之公仆也”，“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辟韩》）。当然，严复在此未免过于美化当时欧美各国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并未深刻了解其内在的矛盾性。严复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当时就认识到了民主与科学之不能分开，在向西方学习中，“舍格致之事，则仅得其皮毛”（《救亡抉论》）。这里所说的“格致”，源于《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是当时对于“科学”一词的译名，它不是指某一种自然科学，而是指科学研究的精神与方法：“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必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要想得出这种博大精深而又能经受着历史考验的科学结论，在研究的过程中，“成见必不可居，饰词必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必勤、必耐、必公、必虚……”。他认为这种科学的精神与方法不仅可以救治中国人的封建迷信和盲目无知之症，而且可以矫正中国知识分子在所谓词章之学中所形成的玄虚、浮夸、荒渺等旧习气，更应以此代替八股取士的旧制度。而“其绝大妙用”又在于培养与锻炼中国人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思维能力与思维方法（《救亡抉论》）。总之，“于学术，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原强》），这就是中国人应当

向西方学习的科学与民主的精神。

戊戌变法失败后短短的几年内，西方许多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 and 他们的著作，纷纷被介绍到中国来。介绍者们意识到，卓越的思想与学术，在人类社会的进步中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甚至可以指导人生，左右世界。能够“自出新说”，有所发现，有所创造，自然是一种巨大的贡献，而能“以其诚恳之气，清高之思，美妙之文”，将别国的新思想、新学术“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其同胞，此其势力，亦复有伟大而不可思议者”。正是在这种思想认识的基础上，梁启超在一篇文章中就介绍了培根、笛卡尔的哲学，哥白尼的天文学，富兰克林的电学，瓦特的汽机学，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伯伦知理的国家学，孟德斯鸠的法学，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的民约论，等等。（《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

从二十世纪初开始，西学之中介绍最多、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最大的，首先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其次是卢梭的民约论。

达尔文的进化论也是由严复最早介绍到中国来的。在《原强》一文中他就介绍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及其以“物竞”、“天择”为主要内容的进化论学说的重大历史意义，1896年更以《天演论》的书名翻译与出版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由于严复是以忧国忧民和“自强保种”的悲愤心情翻译这本书的，所以在他的序言及按语中常常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发表一些启人深思的议论，这就进一步加强了进化论在广大读者中的影响。据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记载，《天演论》出版后“一新世人耳目”，所以“嗣是以后，达尔文、斯宾塞之名，腾于众人之口，‘物竞天择’之语，见于通俗之文”。社会实践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改良派的梁启超、革命派的孙中山，都以进化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文学家鲁迅与学者胡适，都是进化论的崇奉者。“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文学进

化论，贯串了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的许多文学论著，鲁迅长时期用进化论批判复古主义，进行反封建的思想斗争。早在1907年他就指出：“吾中国爱智之士，独不与西方同，心神所往，辽远在唐虞，或经入古初……。其说照之人类进化史实，事正背驰。”（《摩罗诗力说》）直到1925年，他还对中国青年们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要反抗他，扑灭他！”（《北京通信》）

最早介绍卢梭及其“民约论”的是梁启超。他在1901年发表于《清议报》的《卢梭学案》一文，对于《民约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在世界上的影响作了详细的论述。他特别指出，从“天赋人权”的基本原则出发，“民约之为物，非以剥削各人之自由权为目的，实以增长竖立各人之自由权为目的者也。民约之为物，不独有有益于人人自由权而已，且为平等主义之根本也”。不久卢梭的《民约论》就由杨廷栋根据日译本翻译过来，为更多的读者所熟知。蒋观云还在《新民丛报》上以《卢梭》为题热情洋溢地歌颂这位法国杰出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与文学家：“世人皆欲杀，法国一卢梭。《民约》倡新义，君威扫旧骄。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章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可见他们当时也是要以卢梭的《民约论》（现译为《社会契约论》）、特别是其中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思想为指导，改造旧中国，首先是要冲破数千年的君权至上、君主专制的封建统治，实现民权至上的民主主义。忧患余生甚至把卢梭当作现代的“圣人”而“天之、地之、父之、母之、师之”（《扞虱谈虎录》）。正是这位卢梭与他的《民约论》，鼓舞了后来成千上万的革命者，使之前仆后继地投入了为推翻封建统治、争取民主自由和人权平等的革命的政治与文化运动。

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初起，主要倡导者的陈独秀仍然将进化论、人权说和社会主义三者看作是“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

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的“近代文明之特征”(《法兰西与近世文明》)。在他当时的实际活动中，进化论与人权说的作用要超过社会主义。

## 第二节 传统旧文化的批判

对于中国传统的封建旧文化的怀疑与批判，也是从明清之际的思想与文学解放运动就开始了的。李卓吾提出人生不能“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儒家的经典《六经》更不能“作为万世之至论”。但他只不过是一位封建社会末期的叛逆者，而并不是新的社会力量的代言人。在那时封建旧势力的强大压力下，发出这种离经叛道之论的李卓吾，也只能以悲剧告终。他对后世的思想影响唯有新的思想启蒙运动出现之后才能明显地表现出来。

十九世纪末，当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开始进入中国的时候，许多知识分子还是强调要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本，辅以西方的富国强兵之术，即必须“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封建统治者看到“西学东渐”已为大势所趋，也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口号，一方面想利用西方的自然科学与应用技术加强国家的实力，一方面拒绝用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改造中国社会制度，极力稳固旧文化的一统天下。但是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大量输入，必然要和传统的封建旧文化及其维护者发生尖锐的矛盾冲突。梁启超后来在回顾这时期进步的知识分子由向西方学习进而向传统文化发出挑战的情况时说：原来，“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当他们接触到西学之后，就如同“忽穴一牖外窥，则粲然者皆昔所未睹也；还顾室中，则沉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于是以其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

蒙期所谓‘经世之学’者相结合，别树一帜，向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清代学术概论》）。严复就是最早举起“叛旗”的一个。他曾在其《辟韩》一文中对历来的封建专制主义及其精神支柱——儒家思想进行过尖锐的批判。后来在《法意》一书的译者按语中，他又从自由平等的观念出发，对于“夫为妻纲”的封建旧礼教进行了抨击。他认为“吾国女子之于其夫，非其自择者也”，在他人包办的婚姻中，女子“从他人之制，为终身之偿，稍一违之，罪大恶极”。男人对于女子又是“己则不义，而责事己者以贞。己之妾媵，列屋间居，而女子其夫既亡，虽恩不足恋，贫不足存，甚或子女亲戚皆不存，而其身犹不可以再嫁”，这实在是太不平等了。（见《法意》24卷26章按语）

在戊戌变法时期，批判封建旧礼教、旧文化、旧制度最有力的是谭嗣同的《仁学》。作者从自然人性的观点出发，指出了以三纲五伦为中心的名教极不人道，“俗学陋行，动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国宪而不敢议”，实则都是历代统治者用来“愚黔首之术”：“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它不仅制人之身，而且还制人之心，“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这后者是更为惨酷，更为烈毒的。而历来的“独夫民贼，固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此为率，取便己故也”。在《仁学》中，谭嗣同以“冲决网罗”的精神，批判了两千年的封建统治与为其服务的传统儒学，特别是孔子之后之荀学。他认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在批判封建旧礼教、旧制度的基础上，谭嗣同描绘出一个以民为本的自由、平等、和谐、统一的理想国，“君主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千里万里，一家一人”。如果还保留“君”、“臣”之名的话，“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民办事者也，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



义也”。这和康有为所理想的“大同”世界颇为相似。

在对传统旧文化的批判上，谭嗣同是颇为坚决彻底的，真可以说具有革命家的精神。他要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冲决利禄之网罗，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但有一点也和康有为、梁启超相近：不批判孔孟。康有为要“托孔改制”，梁启超把孔子打扮成一位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圣人。谭嗣同也认为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及为之服务的荀学，“罔不托之于孔”，实则是败坏了孔孟之学的声誉。据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所记，在戊戌变法之前他和谭嗣同、夏曾佑等，都认为孔门之学，后衍为孟子、荀子两派，荀传小康，孟传大同。“两千年间，宗派屡变，皆盘旋荀学肘下。孟学绝，而孔学亦衰”。于是在批判封建旧礼教、旧制度的时候，就以荀学为其思想根源，并且认为孟子的“民贵君轻”的思想颇合西方的民权平等之意。谭嗣同的《仁学》对于封建专制主义及传统旧文化的批判，正是反映了这一观点。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对康有为的“托孔改制”的保守性有了较清醒的认识，而康有为的继续打出孔子的旗号宣传保皇主义，甚至要“定孔教为国教”，就更加使他们意识到批判孔门儒学的重要性。章太炎在删革重印的《馥书》中，率先批判孔子的“虚誉夺实”和尊孔派的“苟务修古”，且仅将孔子下比“汉之刘歆”。从此“孔子遂大失其价值，一时群言，多攻孔子矣”（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引自《章太炎年谱长编》）。连梁启超这时也觉悟到“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1902年5月给康有为信），并亲自撰写了《保教非所谓尊孔论》，历数保教尊孔之“束缚国民思想”。其中说：“我中国学界之光明，人物之伟大，莫胜战国，盖思想自由之明效也。及秦始皇焚百家之语，坑方术之士，而思想为之一窒。及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凡不在六艺之科者，绝无